

谁主认同?

转型时期中国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多重建构及其世代变迁

社会
2022 · 4
CJS
第 42 卷

王 鹏 千一卿

摘 要: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但缺乏多重建构视角下基于长期转型背景的世代变迁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已婚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是否受到婚姻匹配与代际流动的影响,丈夫、父亲与女性自身的客观阶层及其差异如何影响女性的主观地位认同;第二,上述影响模式如何随出生世代发生变化。在使用对角线参照模型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17年的合并数据后发现:相较于自身的客观阶层,中国已婚女性整体上倾向于以丈夫的客观阶层来建构自身的阶层认同,但越年轻的世代这一倾向越弱;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则与自身客观阶层的影响并重,甚至随世代变迁略有增强。上述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家庭现代化模式,即已婚女性虽愈少依赖于配偶,但依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紧密连结。

关键词:阶层认同 女性 社会转型 世代变迁 对角线参照模型

Who Dominates? Multiple Constructions of Women'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and Their Cohort Dynamics in Transitional China

WANG Peng GAN Yiqing

* 作者 1: 王 鹏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Author 1: WANG P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作者 2: 千一卿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Author 2: GAN Yiqing, Fud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Soci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E-mail: yiqing_gan@link.cuhk.edu.hk

**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 2020 年度原创科研个性化支持项目(“从 0 出发”项目)“巨变社会中的代内流动与心理健康:探索边界、速度及轨迹的影响”(项目号:IDH3548015/014)的资助。[The research is funded by the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Great Transition: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oundary, Speed and Trajectory (Project Number: IDH3548015/014) of Fudan University 2020 Personalized Support Project for original scientific research (starting from 0).]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谭康荣教授、南京大学许琪副教授及《社会》匿名审稿人在本文撰写和修改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文责自负。

Abstract: How women construct their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However, the discussion of the multiple constructed model of women's class identity in existing studies lacks of depth, nor is there an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al changes of the model. This study aims to answer two important question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society in transition: first, which is the most dominant factor in shaping married women'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the class of their own, their husbands', or their fathers'? Answers to this question reveal the impacts of assortative mat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Second, how does the multiple construction pattern change across birth cohorts? The cohort dynamics help reflect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roles and family values in China. Using the pooled data from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in 2010–2017 and the Diagonal Reference Models, our study finds that in general Chinese married women tend to construct their own class identity based on the objective class of their husbands, but this trend is reversed in the younger cohorts. Fathers' objective class status carries roughly the same weight as women's own, but its impact becomes moderately stronger in younger cohorts. Taken together, 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 a special pathway of family moderniz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that is, married women, although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of their spouses, still maintai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natal families.

Keyword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women, social transition, cohort dynamics, Diagonal Reference Models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转型。伴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济协调体制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阶层分化开始加剧,作为客观社会阶层的主观反映,阶层认同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刘欣,2001;李培林、张翼,2008;陈云松、范晓光,2016;张海东、杨城晨,2017)。同时,阶层认同研究的性别视角,即在建构自身的主观阶层认同方面的性别差异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关注(郭秋菊,2016;许琪、熊略宏,2016;许琪,2018;张文宏等,2021a,2021b)。其中,女性的主观阶层认同在多大程度上由其自身的阶层地位决定是社会性别平等程度和性别观念的体现,这一程度的发展与变化进一步反映了特定社会环境影响下性别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无论是对于社会分层

与流动研究,还是对于价值观念变迁与家庭现代化研究,了解女性阶层认同的形成与变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axter, 1994; Yamaguchi and Wang, 2002)。

长期以来,由于大多数社会存在男女地位差异,女性的阶层属性或自我阶层定位常常被认为是附着于家庭,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女性的阶层认同问题一直被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忽视。然而,过去几十年女性就业状况的改善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使得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女性主体地位的变化及其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Stanworth, 1984; Abbott, 1987)。在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传统社会的女性被传统生产方式和封建礼教压制,很少有独立性。“三从四德”中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即是女性社会地位附属于父权和夫权的表现。1949年之后,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女性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男女收入差距出现拉大的趋势(李实等, 2014),部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开始向传统回归(杨菊华, 2017),这也引发了研究者对当代性别不平等问题关注。另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结构,增加了女性向上流动的机会,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提高了女性自我发展的可能,现代妇女运动与女权思想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的性别观念(李汪洋、谢宇, 2015)。这些变化又似乎推动了女性的阶层认同向更加自主的方向转变。那么,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来说,在定位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自身所处的客观阶层来判断,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流动和婚姻匹配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激烈的社会转型,女性在阶层认同的独立性上是否发生了某种方向性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尤其是后者,过往研究进行了重要的开拓工作(许琪, 2018; 张文宏等, 2021a, 2021b),但囿于数据,仍然缺乏有关对长期转型过程中女性阶层认同的讨论。本文借鉴社会流动领域的相关研究,在一个更长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试图从世代变迁的角度考察中国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多重建构模式及其变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现代化与女性阶层认同的理论视角转变

西方的阶层分析与社会分层研究长期聚焦于男性的阶层地位

(Hayes and Miller, 1993;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a; Sørensen, 1994), 关于女性自身阶层地位的研究则被边缘化。这一阶层分析的“传统路径”(conventional approach)源于将家庭作为阶层分析基本单位的理论视角。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家庭(尤指核心家庭)作为一个共享的生育、生产和消费的单位,将男性、女性与外部的社会形态和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基于长久以来女性较低的劳动参与率和较高的工作不稳定性,传统理论路径认为女性附属于家庭,缺乏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个体化阶层地位。因此,家庭是分析女性客观阶层乃至主观阶层认同的基本单位(Goldthorpe, 1983; M. Jackman and R. Jackman, 1983)。从这一视角出发,主流理论在建构社会分层时将性别秩序视作天然的存在。即使一部分女性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研究者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她们(Allen, 1982)。在具体的研究中,女性的阶层地位一般被认为是取决于她们所依附的男性户主,也即,未婚女性是由父亲的阶层主导,已婚女性则是取决于丈夫的阶层(Hayes and Jones, 1992; Hayes and Miller, 1993),她们自身的职业状况可以忽略不计。女性阶层认同的家庭视角在戈德索普(Goldthorpe, 1983, 1984)那里得到充分阐释,他认为,首先,家庭而非个体才是阶层分析的基本单位;其次,由于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结构,大多数女性的职业生涯较短暂,对工作的依恋感较弱,在经济上主要依赖男性,家庭的阶层地位因此主要由男性决定,而这一点理应在阶级分析中体现出来。尽管在后续研究中,他开始逐渐倾向于家庭中的地位支配性模式(dominance model)非绝对的男性主导(Goldthorpe and Payne, 1986;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88, 1992b),但阶层分析中的男性偏向依然存在。

然而,上述传统的阶层分析模式在社会快速的发展与变迁面前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第一,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和以男性为养家之人(breadwinner)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一“养家之人”角色在相当一部分家庭转由女性承担,社会经济上的性别平等程度得到提高(Besamusca, *et al.*, 2015; Bloom, *et al.*, 2015)。第二,伴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潮流,西方社会的家庭结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晚婚、离婚现象逐渐变得普遍,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加,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家庭”(no families)模式(Goldscheider and

Waite, 1991; Yamaguchi and Wang, 2002),这使得女性建立阶层认同时对男性的依附变小。上述两个转变都解构了男性客观阶层在定义家庭和女性的阶层地位上的作用。由此,研究者提出了理解女性阶层认同的新视角——个体化视角。这一视角认为,应当将女性与男性同等看待,根据他们自身的职业衡量各自的阶层地位,目前没有就业的女性应该基于自己以前的就业情况(Stanworth, 1984; Abbott and Sapsford, 1987),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应当由自身所处的客观阶层决定(Acker, 1973; Ritter and Hargens, 1975)。

戴维斯和罗宾逊(Davis and Robinson, 1988, 1998)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将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与夫妻间客观阶层地位的关系总结为三个主要的假设。一是“独立假设”,即妻子的主观阶层仅由自身的客观阶层属性决定;二是“地位借用假设”或“依附假设”,即妻子的主观阶层仅取决于丈夫的客观阶层属性;三是“地位共享假设”,即妻子的阶级认同取决于她们自己和丈夫共同的阶层属性,或在更狭义上取决于两者属性的均值。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社会中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经历了由“地位借用”(由丈夫阶层决定)向“地位共享”(夫妻双方阶层共同决定)的转变。赖特(Wright, 1989)则从阶层分析的角度将夫妻间的阶层共享关系进一步理论化,他认为,个人可以直接、个体化地参与各类社会关系(包括生产、组织权力以及技能等),或是通过配偶与这些关系产生间接联系,即个体对阶层的感知包含自我直接的或以配偶作为中介的间接的方式。因此,妻子的阶层认同既可以通过自身的阶层位置获得,也能够通过丈夫的阶层位置间接获得。之后大部分基于美国经验的研究都支持女性阶层认同的“地位共享假设”(Luo and Brayfield, 1996; Yamaguchi and Wang, 2002; Newman and Tanner-Smith, 2008)。

这种由家庭到个体、由“地位借用”到“地位共享”的变化,与以英格哈特和贝克尔(Inglehart and Baker, 2000)的观点为代表的价值观变迁的现代化理论相契合,其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在家庭内部和价值观层面的反映,即家庭内性别角色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由男性主导向男女平等转变的线性变迁路径。

另一方面,尽管在家庭或个体视角下,女性阶层认同与丈夫阶层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考察的重点,但父亲阶层所代表的阶层出身的影响同样在研究中有所涉及。阶层出身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出身阶层会对女性的性别观念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阶层认知。研究发现,在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成长的女性的性别平等观念也更强(Kulik, 2002; Marks, *et al.*, 2009; 刘爱玉、佟新, 2014),这会进一步影响女性婚后对自身阶层的主观判断。其二,出身阶层会直接影响阶层认知。出身阶层决定了个体在生命历程早期的家庭生活模式和经历,个体对于阶层的态度与感知很大程度上在这一阶段已经形塑完成(Ablemann, 1997; Yaish and Andersen, 2012),所以,出身阶层也会直接影响个体对当前所处阶层的主观自我定位(Curtis, 2016)。因此,在研究已婚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时,除丈夫的客观阶层之外,父亲的客观阶层同样不可忽视。与配偶阶层类似,出身阶层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也会随着世代的推移而变化,而变化方向是否也会沿着现代化理论预测的路径,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考察。

(二)中国语境下的女性阶层认同及其变迁

1. 女性阶层认同的多重建构与世代视角

上文总结了经典阶层分析中有关女性阶层认同的主要理论视角。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中国,许琪(2018)提出,中国背景下的阶层认同是配偶与原生家庭共同影响的“混合型”阶层认同。“混合型”阶层认同为我们理解中国语境下的女性阶层认同提供了基本的解释框架。这一概念指出,在中国社会,个体的阶层认同是一种多重建构的模式,夫妻、代际间的阶层关系共同形塑了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基于已有的经验发现和上文的理论视角,本文在讨论中国女性的阶层认同时,同样会综合考虑这两类阶层关系。其中,夫妻间的阶层关系体现在婚姻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匹配,代际间的阶层关系则表现为父代与子代的阶层流动。这两类阶层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也可能具有各自的形成逻辑和独特的变化路径。

此外,为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探究女性阶层认同模式的变迁,本文将着重考察这一模式随出生世代的变化趋势。研究世代间差异的重要性在于,出生于同一时期的群体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经历的历史事件类似,所以塑造了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惯习,保留了成长时期共同文化的影响。即使个体本身的文化价值观念没有太大改变,世代的交替也会驱动整体社会观念的变革(Ryder, 1965; Inglehart, 1971)。因此,世代变迁是判断价值观念变化的重要手段,世代的更迭也可以作为估计

未来发展趋势的途径。考察不同世代间的差异也成为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分析变迁趋势的主要方式之一(Elder, 1994; 李路路、石磊、朱斌, 2018; Zhou and Xie, 2019)。就本研究而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性别平等状况、国家政策等都会对不同世代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越往前的世代,越容易受到更早时期社会状况的影响。因此,通过检验世代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推断不同转型时期中国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变迁情况。那么,除了现代化带来的家庭与个体的张力之外,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转型现实又对女性的阶层认同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 改革前的女性阶层认同

“男尊女卑”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地位的显著特征。女性不仅在劳动关系中被局限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模式,在观念和认知上也被一整套封建礼教和习俗所束缚。“三从四德”中所谓“妇人有三从之义……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¹虽本指儒家仪礼规范中女性的服丧标准,随着社会发展,却已经成为伦常秩序中女性依附和服从男性的经典话语。“父母之命”“夫唱妇随”等说法也是女性从属于家长与丈夫的反映。总之,传统社会从社会分工、文化观念、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等层面确立了男女之间等级有序的支配关系(吴小英, 2009; 杨菊华, 2014, 2017)。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革命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引领下,国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推进男女平等的进程,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范、制度安排和政治宣导,带领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建设和政治运动中来。“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天”成为新的政治时尚和主流意识形态(谭深, 1997; 金一虹, 2006; 吴小英, 2009)。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成立初期的新中国所开展的阶级解放与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际平, 2005)。尽管这种改变被认为更多体现在公共领域而非个体层面,且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性别观念影响有限(吴小英, 2009; 蒋永萍, 2012),但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与建设洪流中,女性开始广泛参与劳动生产。中国女性的高劳动参与率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彭青青等, 2017),不仅高于东亚的日本、韩国,也高过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²这对中国社会的性别

1. 出自《仪礼·丧服·子夏传》。

2. 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files/latestpub/gjnj/2018/zk/indexch.htm>)。

观念与女性的阶层认同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改革开放后的女性阶层认同

迈入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时期,伴随着社会各领域的巨大变化,中国女性的阶层认同开始受到不同力量的冲击并开始重塑。下面我们分别从配偶阶层和出身阶层的影响这两方面来探讨转型时期女性阶层认同的变迁问题。

(1) 配偶阶层与女性阶层认同

女性阶层认同受丈夫影响的程度是性别角色平等化程度的体现。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性别角色将摆脱传统的男性主导,向着平等化的方向转变(Inglehart and Baker, 2000)。改革后的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同样包含推动性别观念平等化的因素。一方面,工业化在农村女性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工作机会,增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推动了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使得改革前难以触及的农村地区也发生了改变(Chen, 2005; Shu and Zhu, 2012; Hu, 2016)。同时,基础教育的普及与高等教育扩张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男女在教育获得上的差异逐步缩小,甚至出现了女性教育程度超过男性的趋势(叶华、吴晓刚, 2011; Treiman, 2013)。教育既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也对阶层地位的获得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样有助于提升女性阶层认同的自主性。此外,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计划生育不仅控制了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缩小了家庭规模,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家庭对女性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提升了女性地位(Wu, *et al.*, 2014; 陆万军、张彬斌, 2016),进而推动了性别观念的平等化。因此,在大规模工业化开始之前出生的世代(如“50后”“60后”)在成长期受现代化转型的影响较小,而更年轻的世代受现代化转型的影响更强。由此,我们提出丈夫对女性地位认同影响的“现代化变迁假设”:

假设 1a: 随着世代的推移,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中国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受丈夫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变小。

另一方面,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在公共领域逐步退潮。这种退潮既体现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话语逐渐让位于效率优先的市场话语,也表现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得就业单位对女性的庇护能力降低(吴小英, 2009;

李汪洋、谢宇, 2015)。以往研究也发现, 随着市场化的加深, 职业的性别隔离程度随之上升, 男女之间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蔡禾、吴小平, 2002; Shu, 2005; Zhang, *et al.*, 2008; 李实等, 2014), 劳动分工方面也出现了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的情况(彭青青等, 2017)。这些都会增加女性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程度, 也引发了研究者关于性别观念向传统“回潮”的讨论(贾云竹、马冬玲, 2015; 杨菊华, 2017)。这些变化反映在阶层认同上, 则是女性的阶层认同由偏向“独立型”向“地位借用型”方向的变化(许琪, 2016, 2018)。因此, 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生的世代, 受改革前国家政策与政治话语的影响较强, 之后的世代则更多受到市场化改革对女性地位冲击的影响。由此, 我们提出与假设 1a 相竞争的女性地位认同的“传统化转向假设”:

假设 1b: 随着世代的推移, 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 中国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受丈夫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变大。

当然, 以上两个假设并未包含所有变迁的可能性。例如, 尽管在改革初期, 较早的世代受市场化的影响出现传统性别观念回潮, 但更年轻的世代(如“80 后”)受计划生育政策和教育扩张的影响, 自幼就在一个性别关系相对平等的环境中长大, 性别平等观念可能更强, 阶层认同也更多由自身的阶层决定。因此, 丈夫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也可能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特点。

(2) 出身阶层与女性阶层认同

如理论回顾部分所言, 出身阶层同样会对女性的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而在转型时期的中国, 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背景使父辈阶层的作用可能会随着世代的推移而发生转变。

以现代化逻辑来看, 传统社会个体的社会成就和阶层认同主要由出身背景决定, 在工业社会中则转变为由后天禀赋(如教育程度、努力情况)决定, 越来越少地受到阶层出身的影响(Treiman, 1970; Curtis, 2016)。在中国, 改革后的工业化进程也极大推动了代际间的社会流动(李路路等, 2018)。与父代相比, 改革后成长的中国人普遍经历了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职业阶层的向上流动。这些都可能会推动女性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 削弱家庭背景对自身阶层认同的作用。由此, 我们提出阶层出身对女性地位认同影响的“现代化变迁假设”:

假设 2a: 随着世代的推移, 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 中国女性的阶层

地位认同受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减小。

但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在某些方面增强了父代对已婚女性的影响。其一,就代际流动性而言,改革前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改造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的继承性,降低了阶层出身对个体成就的作用(Parish, 1981, 1984; Deng and Treiman, 1997)。而改革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取消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有所不同。这一转变增强了父辈阶层对子代阶层流动和地位获得的影响(李路路、朱斌, 2015; Zhou and Xie, 2019),进而强化了阶层出身对女性阶层认同的作用。其二,中国历来就有比西方更为紧密的代际联系,体现在代际抚养和反馈方式、经济支持与情感慰藉、日常照料与居住模式等方面(王跃生, 2014; 许琪, 2018)。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代际之间的种种联系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进程而衰落,反而在经济风险、婚姻风险增大的背景下有所强化(杨菊华、李路路, 2009; 刘汶蓉, 2016; 石金群, 2016; 曾旭辉、李奕丰, 2020)。双方父母对子女买房的支持、隔代照料和“啃老现象”,都是这种亲子结构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三,计划生育政策也极大影响了家庭继承关系和女性在代际转移中的角色。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现提高了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使家庭出身成为影响女性阶层认同更为重要的变量(王跃生, 2016; 郑丹丹, 2019)。基于以上三点,我们提出阶层出身对女性地位认同影响的“传统化转向假设”:

假设 2b: 随着世代的推移,相较于自身客观阶层,中国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受父亲客观阶层的影响不断增强。

同样,我们应该考虑到父代的阶层的影响也可能是非线性的。例如,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代际流动的增加,家庭出身的影响有所减小,但随着近年来全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继承关系的变化,家庭出身对女性的影响又开始提升。囿于篇幅,这些可能性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丈夫与父亲的影响都存在现代化变迁与传统化转向两种可能的方向,但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存在差别,相同的推动因素的作用结果也有差异,因此,二者并不一定同步变化。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可能会通过推动性别平等的方式降低丈夫对妻子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使其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代际关系方面,却可能

增强代际间的联系,从而强化父亲对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使其发生传统化转向。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化变迁与传统化转向只代表一种变迁的方向而非内在动因。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传统或现代来概括影响因素,而需要关注转型力量之于不同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后果。尽管以上的主要假设并未涵盖女性阶层地位认同变迁的所有情况,却为我们考察配偶阶层与出身阶层的影响提供了基本思路 and 方向。下文将利用实证分析对这些假设分别进行检验。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如何受到婚姻匹配、代际流动带来的多重建构模式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否随世代的推移而变化。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分辨丈夫、父亲的阶层各自对女性阶层认同的作用,以及他们与女性自身阶层之间的差异的作用。以婚姻匹配状况为例,当夫妻客观阶层地位一致时,女性的主观地位体现了该客观阶层在主观层面的一般反映;当两者不一致时,夫妻双方的阶层都可能会对女性的主观地位产生影响,同时,婚姻匹配的类型(向上婚与向下婚)可能存在单独的作用。代际流动的影响也与此类似。而传统模型主要基于线性回归技术,由于受制于共线性问题或较强的理论假定,无法分离出阶层的主效应与阶层之间差异的效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分析代际流动后果的经典模型——“对角线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 Model, 简称 DRM),起初是由索贝尔(Sobel, 1981, 1985)在分析社会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时提出,因为可以较好地区分出身阶层、当前阶层及其之间差异的作用,所以也被广泛应用于代际与代内流动、婚姻匹配、主客观地位及其社会后果的一系列研究(王甫勤, 2011; Chen, 2018; Jin, *et al.*, 2019)。

“对角线参照模型”将研究对象置于两个阶层变量(例如父亲阶层和本人阶层)的交叉列联表中,以具有相同阶层的群体(对角线单元格)作为其他群体(非对角线单元格)的参照,并以此群体的效应作为阶层的主效应。其依据在于,阶层一致的群体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该阶层的固有属性,并构成了这一阶层的核心(De Graaf, *et al.*, 1995)。当两者阶层

不一致时,各自阶层作用的重要性用行效应和列效应的权重表示,且设定权重之和为1。³因此,本文的基础模型可以表示为:

$$Y_{ij} = p\mu_{ii} + q\mu_{jj} + \sum \beta_k X + \var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Y_{ij} 是本文的因变量,代表配偶(或父亲)的阶层为 i 、自身阶层为 j 的女性的自我阶层地位认同, μ_{ii} 和 μ_{jj} 分别为行效应和列效应,即配偶(或父亲)阶层的影响以及自身阶层的影响, 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特别的是, p 和 q 的取值范围均为 $(0,1)$ 且 $p + q = 1$,也就是说,女性的阶层地位认同可以表示为配偶(或父亲)阶层与自身阶层效应的加权之和。

为了检验女性阶层认同模式的变迁情况,我们考虑配偶(或父亲)阶层的作用可能随出生世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将主效应的权重与世代进行交互,得到的世代变迁模型如下:

$$Y_{jic} = p_c \mu_{ii c} + q_c \mu_{jj c} + \sum \beta_k X + \varepsilon_{ij} \quad (2)$$

上述模型将夫妻阶层匹配或父女代际流动的效应分解为行效应与列效应,并要求二者权重之和为1,实质上是认为非对角线单元格的值处在对应的两个对角线单元格之间。但是,夫妻之间向上婚或向下婚,父女之间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都可能对女性的阶层认同有独立于行列效应之外的单独作用(Zhao, *et al.*, 2017; Chen, 2018)。因此,我们将婚姻匹配效应或代际流动效应作为控制变量单独加入模型,得到匹配(流动)效应模型:

$$Y_{jic} = p_c \mu_{ii c} + q_c \mu_{jj c} + \sum \beta_k X + \sum \gamma_n M + \varepsilon_{ij} \quad (3)$$

与模型2不同的是,模型3加入了阶层搭配模式的虚拟变量 M ,代表夫妻间婚姻匹配的不同类型或是代际间阶层流动的不同方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控制了婚姻匹配或代际流动状况的效应之后行效应和列效应的相对权重。

(二)数据与变量

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作为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标准抽样调查,CGSS的抽样设计和调查问卷保持着跨期次的相对一致性,且覆盖了受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受访者及其父亲、配

3. 该设定实质上是假定当两个阶层不一致时,结果变量应处于较高与较低阶层的效应之间。如女性的主观地位应当处于其自身与丈夫所在客观阶层一般代表的主观地位之间。由下文的描述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这一假定在本文当中能够得到满足。

偶的客观职业状况等信息,为考察女性阶层认同的变迁提供了数据条件。我们合并了CGSS的2010年、2012年、2013年、2015年、2017年共五期数据,获得了一个涵盖较长世代范围的大样本。多期数据的使用也有利于考察世代效应时排除受访者的年龄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已婚有配偶的女性,这一部分群体占了总体女性样本的77%,可以说代表了大多数女性的状况。为了方便地考察较长范围内世代变迁的趋势,我们以10年为一个单位,选择了“50后”(1950—1959年出生)、“60后”(1960—1969年出生)、“70后”(1970—1979年出生)、“80后”(1980—1989年出生)四个出生世代的女性,并将其受访时的年龄范围限定为21—64岁。我们也对每一期调查数据的抽样权重进行了标准化,使其在每一期内的均值为1。在删除不符合条件的样本以及缺失值之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3 550个。

2. 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女性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从CGSS2010到CGSS2017的五期调查都是采用10级阶梯式量表对受访者的主观社会阶层进行测量,其中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本文借鉴已有阶层认同的研究(陈云松、范晓光,2016;许琪,2018),将其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处理,以便于对模型结果进行解释。

本文最为关注的自变量是受访者自身、丈夫以及父亲三者的客观社会阶层。尽管客观阶层有不同的测量方法,但社会分层与流动领域最为广泛使用的指标依然是以职业为基础的阶层分类。⁴职业阶层反映了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阶层的关系(Wright, 2005),也是个体社会成就的综合体现。本文采用埃里克森等(Erikson, *et al.*, 1979)的EGP阶级图式来对客观阶层进行分类。EGP阶级分类综合考虑了职业状况和雇佣关系,共分为十一类阶层。由于EGP阶级图式基于分类属性,并不具有完全的序次层级性,为方便阶层差异的解释和结果的呈现,本文参照以往的研究对不同阶层进行合并(李路路、朱斌, 2015; Chen, 2018),最终形成四类阶层,分别是高级非体力阶层(EGP中的阶层I、II,包括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一般非体力阶层(EGP中的阶层IIIa、IIIb、IVa、IVb,包括白领阶层和自雇佣者)、体力阶层(EGP中的

4.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样针对其他客观阶层指标(如教育程度)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展示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阶层 V、VI、VIIa, 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和农民阶层(EGP 中的阶层 IVc、VIIIb)。⁵ 女性的客观阶层主要由当前的职业确定, 如果当前没有职业或职业缺失, 则由最近的一份职业确定(Stanworth, 1984)。

表 1 和表 2 分别展示了本人与配偶、本人与父辈阶层的 4×4 交叉列联表, 包括各个单元格中本人阶层地位的均值以及样本数。首先, 从两张表的边缘分布可以看出, 女性客观阶层占比最大的是农民, 其次为一般非体力阶层, 而丈夫属于体力阶层的最多, 其次为农民。这反映了男女阶层结构的差异, 也与改革开放以来男性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高于女性, 甚至出现“留守妻子”的现象有关(段成荣等, 2017)。父亲阶层中农民比例非常高, 其他阶层比例都相对更低, 反映了改革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职业阶层的广泛向上流动。其次, 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均值低于 5, 这也是中国社会主观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体现(陈云松、范晓光, 2016)。从各个边缘维度看, 主观地位的数值都随着阶层的下降而降低, 从对角线单元格来看也是如此, 即阶层越低, 女性的主观地位认同也越低。而非对角线单元格地位认同的均值, 基本处于所在行和列的对角线单元格的均值之间。这也从直观上反映出女性主观地位认同不仅受到自身客观阶层的影响, 也受到配偶或父亲阶层的影响, 因此使用“对角线参照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这种不同成员客观阶层的共同作用。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民族、健康状况等)、社会经济变量(如党员身份、工作单位等)、⁶ 所在地区和采访年份。已有研究发现, 人口迁移, 尤其是城乡人口流动对于女性的性别观念有重要影响(Hu, 2016; 许琪, 2016), 因此本文也将城乡类别以及人口迁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样本中主要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显示, 从婚姻的阶层匹配模式来看, 阶层同质婚占多数

5. 一些学者将体力阶层与农民阶层合并为一个整体的“体力阶层”进行分析, 但本文认为, 在中国社会中, 农民与非农阶层之间在生活机会、社会认知和态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且数据也显示二者的阶层认同差距较大(见表 1), 因此在分析阶层认同时仍然需要将二者分开来看。

6. 本文未加入教育程度或收入等社会经济变量, 因为它们与职业阶层有较强的相关性。控制这些变量则会影响主效应的估计。尽管如此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不影响本文主要结论, 读者如果希望获取相应结果, 可与作者联系。

表 1：本人阶层、配偶阶层与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描述统计

配偶阶层 本人阶层	高级 非体力阶层	一般 非体力阶层	体力阶层	农民阶层	总计
高级非体力阶层	5.12 (872)	4.89 (812)	4.64 (242)	4.59 (162)	4.94 (2 088)
一般非体力阶层	4.93 (366)	4.57 (1 482)	4.38 (366)	4.41 (279)	4.58 (2 493)
体力阶层	4.47 (433)	4.21 (1 113)	4.14 (1 667)	4.09 (1 683)	4.16 (4 896)
农民阶层	4.73 (65)	4.21 (171)	3.94 (197)	3.85 (3 640)	3.89 (4 073)
总计	4.91 (1 736)	4.51 (3 578)	4.21 (2 472)	3.97 (5 764)	4.28 (13 550)

注：单元格内数字为该类别主观阶层地位的均值，已经经过加权处理；括号内为该单元格样本数。

表 2：本人阶层、父亲阶层与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描述统计

父亲阶层 本人阶层	高级 非体力阶层	一般 非体力阶层	体力阶层	农民阶层	总计
高级非体力阶层	5.13 (492)	4.89 (544)	4.50 (207)	4.04 (301)	4.74 (1 544)
一般非体力阶层	5.04 (297)	4.50 (572)	4.30 (209)	4.39 (196)	4.58 (1 274)
体力阶层	4.81 (328)	4.63 (734)	4.23 (458)	3.98 (183)	4.49 (1 703)
农民阶层	4.72 (619)	4.35 (1 728)	4.15 (1 598)	3.95 (5 084)	4.12 (9 029)
总计	4.91 (1 736)	4.51 (3 578)	4.21 (2 472)	3.97 (5 764)	4.28 (13 550)

注：单元格内数字为该类别主观阶层地位的均值，已经经过加权处理；括号内为该单元格样本数。

(55.6%)，女性向上婚(丈夫阶层地位高于妻子)的比例高于向下婚。从代际阶层流动方向来看，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女性占 38.8%，远高于向下流动的比例，这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向上流动趋势。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对角线参照模型”分别对配偶、父亲阶层与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和变化趋势进行检验。

表 3:主要自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变量	百分比(%) / 均值
年龄	43.660(10.008)	城乡类别	
出生世代		城市	53.4
50 后	18.2	农村	46.6
60 后	32.5	迁移状况	
70 后	29.1	本地居民	89.2
80 后	20.2	非本地居民	10.8
民族		地区	
汉族	90.7	东部	33.9
少数民族	9.3	东北	12.4
健康状况		中部	26.9
一般或以上	83.5	西部	26.8
一般以下	16.5	婚姻匹配模式	
党员身份		同类婚	55.6
党员	5.2	向上婚	27.2
非党员	94.8	向下婚	17.2
工作单位		代际流动模式	
体制内	12.9	不流动	49.0
体制外	87.1	向上流动	38.8
		向下流动	12.2

注:表格中数值均为加权后结果;“年龄”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模型分析结果

(一)配偶阶层与女性阶层认同

首先要考虑的是夫妻双方的客观阶层与女性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关系。在这一部分的模型中(见表 4),我们加入了代表父亲客观阶层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家庭出身的作用,分析结果展示了女性本人阶层与配偶阶层对女性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的相对影响。

首先,从对角线效应来看,夫妻双方客观阶层一致(同质婚)的群体,女性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阶层呈明显的正向相关性。与配偶同属高级非体力阶层的女性,以及与配偶同属一般非体力阶层的女性,对自身的主观地位认知较高。其他两种同质婚,即与配偶同属体力阶层或农民阶层的女性,主观地位则较平均水平更低。但阶层间的差异并非线性变化,如体力阶层与一般非体力阶层的主观地位差异,就明显高于体力

表 4：本人阶层、配偶阶层对于女性地位认同的影响 (N=13 550)

	模型 1 基础模型	模型 2 世代变迁模型	模型 3 匹配效应模型
对角线效应			
高级非体力阶层	0.484*** (0.049)	0.488*** (0.046)	0.496*** (0.047)
一般非体力阶层	0.167*** (0.034)	0.162*** (0.033)	0.162*** (0.034)
体力阶层	-0.248*** (0.033)	-0.248*** (0.032)	-0.261*** (0.034)
农民阶层	-0.402*** (0.038)	-0.402*** (0.037)	-0.396*** (0.040)
配偶效应权重			
不分世代	0.704*** (0.065)		
50 后		0.699*** (0.150)	0.548** (0.175)
60 后		0.994*** (0.109)	0.829*** (0.145)
70 后		0.642*** (0.995)	0.471** (0.149)
80 后		0.428*** (0.113)	0.265* (0.153)
控制变量			
年龄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民族 (“少数民族”=1)	0.138* (0.055)	0.140* (0.055)	0.139* (0.055)
健康状况 (“健康”=1)	0.485*** (0.047)	0.486*** (0.046)	0.488*** (0.047)
党员身份 (“党员”=1)	0.313*** (0.071)	0.316*** (0.070)	0.312*** (0.071)
工作单位 (“体制内”=1)	0.166** (0.053)	0.161** (0.053)	0.159** (0.053)
城乡类别 (“城市”=1)	-0.179*** (0.040)	-0.176*** (0.040)	-0.165*** (0.041)

(接表 4)

	模型 1 基础模型	模型 2 世代变迁模型	模型 3 匹配效应模型
迁移状况(“流动人口”=1)	-0.139** (0.050)	-0.132** (0.050)	-0.132** (0.050)
地区(“东部”为参照)			
东北	-0.406*** (0.053)	-0.403*** (0.053)	-0.404*** (0.053)
中部	-0.177*** (0.041)	-0.178*** (0.041)	-0.183*** (0.041)
西部	-0.283*** (0.044)	-0.282*** (0.043)	-0.285*** (0.044)
父亲阶层(“高级非体力”为参照)			
一般非体力阶层	-0.124+ (0.066)	-0.123+ (0.066)	-0.123+ (0.066)
体力阶层	-0.171** (0.062)	-0.171** (0.062)	-0.168** (0.062)
农民阶层	-0.245*** (0.052)	-0.244*** (0.051)	-0.244*** (0.051)
年份(“2010”为参照组)			
2012	0.122* (0.048)	0.120* (0.048)	0.120* (0.048)
2013	0.206*** (0.046)	0.204*** (0.046)	0.205*** (0.046)
2015	0.150** (0.047)	0.146** (0.047)	0.147** (0.047)
2017	0.018 (0.046)	0.015 (0.046)	0.017 (0.046)
婚姻匹配模式(“同类婚”为参照组)			
向上婚			0.069 (0.054)
向下婚			-0.094 (0.070)
截距	4.364*** (0.112)	4.348*** (0.111)	4.343*** (0.113)
AIC	50 757	50 743	50 744

注：+ p < 0.10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模型已加权。

阶层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差异(差异分别为 0.415 和 0.154)。

以同质婚群体为参照，我们进一步来看夫妻双方阶层不一致的情况。文献回顾部分已经提到，当本人与丈夫的客观阶层出现差异时，女性可能会偏重于其中一方来构建自身的地位认同。表 4 的模型 1 显示，配偶客观阶层的权重为 0.704，远高于女性自身阶层的权重($1-0.704=0.296$)。这一结果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已婚女性整体上更依赖于丈夫的客观阶层来定义自身的阶层地位，也即前文所讲的“地位借用型”或“依附型”地位认同模式在总样本上得到了支持。

表 4 的模型 2 进一步检验了这一主观阶层地位的构建模式是否随世代的推移而变化。图 1 清晰呈现了夫妻双方客观阶层的相对权重。可以看出，“50 后”女性在对丈夫阶层的依赖程度上与整体样本接近。“60 后”女性配偶客观阶层的权重达到 99.4%，也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其主观阶层地位几乎完全由丈夫的客观阶层决定。在更年轻的两个世代中，配偶客观阶层的权重明显下降，其中，“80 后”更降至 43%左右，即女性本人阶层的影响已与配偶阶层的影响并重，甚至小幅度超过了配偶阶层。文献所说的“地位共享型”甚至是偏向“独立型”模式已在年轻世代的女性中出现。当我们控制了婚姻匹配模式的独立效应后(表 4 模型 3)，配偶阶层的权重整体上有所减小，但上述世代变化模式保持不变。因此，从总体趋势上看，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1a，即相较于自身的客观阶层，女性的主观地位受丈夫阶层的影响逐渐减小。当然，这一趋势自“60 后”之后的世代才愈发明显，而从“50 后”到“60 后”，丈夫客观阶层的影响甚至有所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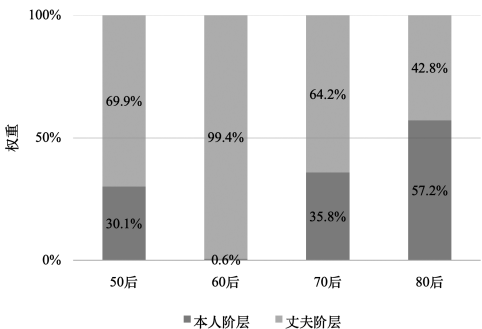


图 1：夫妻双方客观阶层影响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

相较于其他出生世代的女性而言,“60后”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其阶层地位认同呈现对配偶的高度依附性特征。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可能与中国20世纪末的市场化转型有密切关系。“60后”女性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期,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兴起之时。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城市地区的原有体制对于性别平等的保护作用被削弱,相较于男性,女性在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李春玲、李实,2008;李汪洋、谢宇,2015)。而在农村地区,男性更可能通过外出务工等方式获得更高的阶层地位,女性则更多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继续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妻子”(周福林,2007;段成荣等,2017)。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也会渗透进家庭,女性更低的经济自主能力使其对于配偶的依赖性相较于之前的世代会有所增加。而对于年轻的“80后”来说,其阶层地位认同呈现明显的“地位共享型”特征。作为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一代,这一群体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小,性别平等意识也更强。而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她们提升自我的客观阶层地位和在家内部的经济话语权。相较于以往世代,这些因素都促使“80后”女性在建构主观的阶层地位时赋予自身的客观阶层更高的重要性。

表4的控制变量的系数显示,更健康、出身阶层更高、拥有党员或少数民族身份、具有本地户口和在体制内工作的女性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主观阶层地位。而在控制了职业阶层的情况下,城市女性对于自身的阶层认知相对较低,这也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果(陈云松、范晓光,2016)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3中女性向上婚对地位认同的影响为正,向下婚则为负,符合社会对于婚姻匹配的普遍印象。但是,二者系数均不显著。且从AIC信息准则的值也可以看出,模型2的拟合情况要略好于模型3。这一结果与关于婚姻匹配与女性幸福感的研究发现(Chen, 2018)相类似,反映出婚姻匹配对于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夫妻双方客观阶层的共同作用上,而向上婚与向下婚本身并无显著的独立影响。

(二)父亲阶层与女性阶层认同

接下来我们讨论代际间阶层流动与女性阶层认同的关系。同样,我们在这一组模型中(见表5)加入了丈夫的阶层以控制配偶的影响。与上文同质婚群体呈现的相关关系一致,在父亲阶层与女性自身阶层一致(代际不流动)的情况下,代际共享的客观阶层与女性主观地位认同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与父亲同属高级非体力阶层的女性主观地位认同最高，一般非体力阶层次之，同属体力阶层或农民阶层的女性则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表 5：本人阶层、父亲阶层对于女性地位认同的影响 (N=13 550)

	模型 1 基础模型基础	模型 2 世代变迁模型	模型 3 流动效应模型
对角线效应			
高级非体力阶层	0.315*** (0.052)	0.319*** (0.054)	0.304*** (0.054)
一般非体力阶层	0.042 (0.044)	0.040 (0.050)	0.032 (0.048)
体力阶层	-0.151** (0.050)	-0.152** (0.051)	-0.155** (0.047)
农民阶层	-0.206*** (0.042)	-0.206*** (0.044)	-0.182** (0.056)
父亲效应权重			
不分世代	0.456*** (0.084)		
50 后		0.380 (0.247)	0.246 (0.318)
60 后		0.416** (0.145)	0.307 (0.217)
70 后		0.505*** (0.125)	0.410* (0.188)
80 后		0.485** (0.170)	0.418* (0.216)
代际流动模式(“不流动”为参照)			
向上流动			0.076 (0.084)
向下流动			-0.004 (0.049)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截距	4.552*** (0.108)	4.560*** (0.111)	4.543*** (0.113)
AIC	50 756	50 762	50 764

注：+ 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模型已加权。

表 5 模型 1 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当父亲阶层与女性自身的阶层不同时，女性在建构主观地位认同时主要采取“地位共享模式”，既受到父亲阶层的影响（权重为 0.456），也受到自身阶层的影响（权重为 1-0.456=0.544），且二者并重。

分世代来看，基于表 5 模型 2 的结果，图 2 展示了不同世代父女的

客观阶层对女性主观地位影响的相对权重。父亲的客观阶层对“50后”女性的影响不显著(p 值为 1.54),但其权重在之后的世代呈小幅上升趋势。整体而言,随着世代的推移,父亲阶层对于女性自身地位认同的作用一直有所保持,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当然,经过检验,这一增强趋势尚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即世代之间权重的差异不显著),但可以判断,出身阶层对于女性地位认同的影响并未像配偶阶层的作用那样随世代推移而减弱。即使对于最新近的世代来说,父辈所在阶层依然对女性的自我地位认同有显著影响。在模型 3 中,当我们进一步控制代际流动可能带来的独立效应后,上述世代变化模式保持不变,代际流动方向本身的效应则不显著。因此,虽然我们 cannot 断言假设 2b 得到了经验支持,但父亲阶层的影响仍然在新世代女性中得到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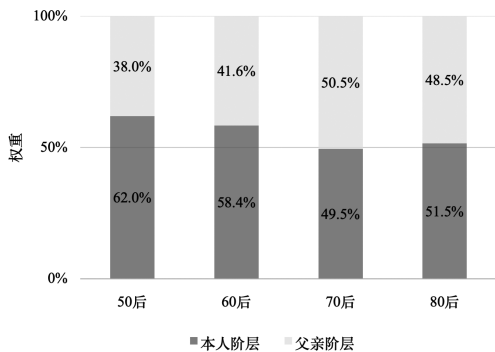


图 2：父女双方客观阶层影响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

五、稳健性检验与补充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首先,上文并未将夫妻或代际之间的比较置于同一模型中。原因在于,“对角线参照模型”将对角线单元格的平均效应作为非对角线单元格的参照,如果同时考虑三者的权重,则是以三维列联表的对角线单元格作为参照,并假定三者的权重之和为 1。一般而言,这一模型假定过强而很难得到满足。因此,本文仅将这一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我们在“世代变迁模型”(模型 2)的基础上考虑“三维对角线参照模型”,所得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看出,将三者的客观阶层置于同一参照

系时，结果与上文的结论基本一致。较早世代的女性（尤其是“60后”），丈夫的客观阶层是决定本人主观阶层地位的主要变量，而本人与父亲阶层的作用相对较小。较晚世代的本人与父亲阶层的权重则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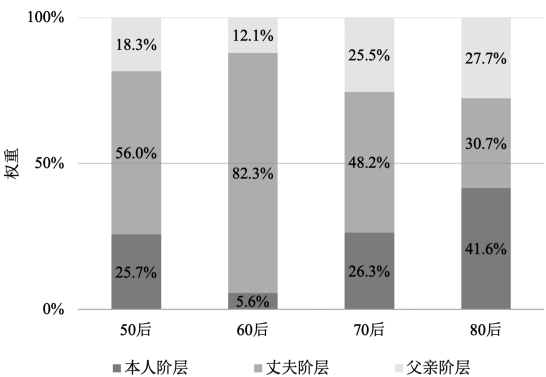


图 3：本人、丈夫与父亲的阶层影响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DRM 分析结果

其次，如前文所述，本文根据理论和方法的需要以类别化的阶层变量衡量夫妻与代际间的社会地位。这与以往一些研究将社会地位视作连续变量的做法不同。在此，我们同样尝试将社会地位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处理，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以及以往研究相比较。我们采用国际标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Ganzeboom and Treiman, 1996)来反映各方综合的社会经济地位，并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使变量系数之间能够相互比较。我们将丈夫、父亲与受访者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并与出生世代进行交互，然后再根据各方的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来确定各自对因变量影响力的相对权重(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到，OLS 分析得到的结果与本文主要分析结果高度一致，与图 3 的结果也基本相同，同样验证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最后，职业阶层能否全面反映客观社会地位依然存在争论。以往研究也指出，教育程度同样是客观阶层的一部分，且作为决定阶层的更加个性化的因素，教育对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与职业阶层有所不同(Davis and Robinson, 1998 ; Yamaguchi and Wang, 2002)。因此，我们也将不同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客观地位的指标，考察其对女性主观地位的影响程度以及世代变迁情况。基于“世代变迁模型”(表 5 模型 2)，图 5 的左右两边分别展示了夫妻以及父女教育程度对女性主观阶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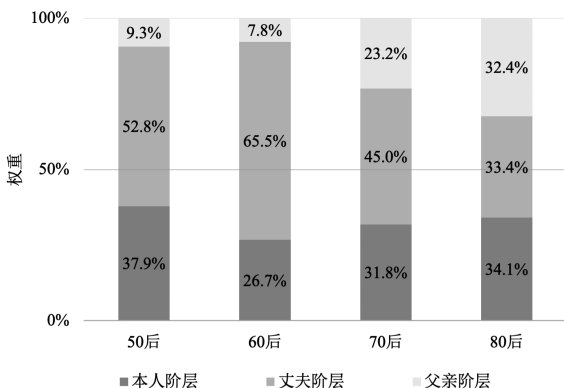


图4：本人、丈夫与父亲的阶层影响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OLS 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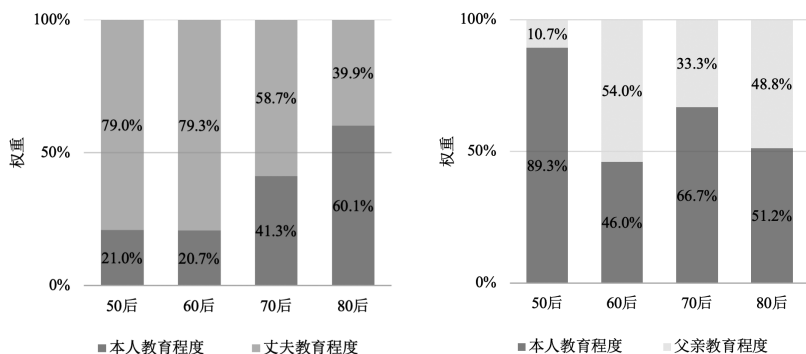


图5：本人、丈夫与父亲教育程度影响女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DRM 分析结果

影响权重。⁷结果显示，与本人的教育程度相比，丈夫的教育程度的影响权重随着世代推移而减小，这与前文基于职业阶层的结果基本一致。而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的权重对“50后”是10.7%，对更近的世代则在50%附近波动，保持了一种“地位共享型”模式。这两者的结果与前文虽略有差别，但基本结论一致，即丈夫相对于本人客观地位的影响随世代推移而减弱，父亲客观地位的影响则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上升。

（二）补充分析：男性阶层地位认同的世代变化

此外，本文也补充了基于男性视角的分析，以更加全面地呈现夫妻

7. 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个类别。读者如果需要详细统计结果，可与本文通讯作者联系。

间地位认知的建构情况。图 6 展示了基于已婚男性样本的跨世代分析结果。从夫妻间阶层地位的影响来看,男性的世代变化较小,且自身客观阶层的作用始终大于妻子的客观阶层,反映了男性更偏向于“独立型”阶层认同模式。但随着世代的推移,其自身阶层的影响相较于早期世代也略微下降。从代际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自“60 后”开始,父亲阶层地位对男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开始逐渐加强,呈现与女性类似的变化趋势。这些结果基本符合此前基于时期变化的研究结论(许琪, 2018; 张文宏等, 2021a)。整体而言,婚姻匹配对于男性的影响没有像女性那样呈现明显的世代变化,但也逐渐向“地位共享型”靠拢;家庭背景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减小,反而呈现增强的趋势。这也反映出,在性别平等化与社会风险增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会转型对于男性与女性的作用强度虽然有所不同,但在塑造其阶层认同模式方面都发挥着类似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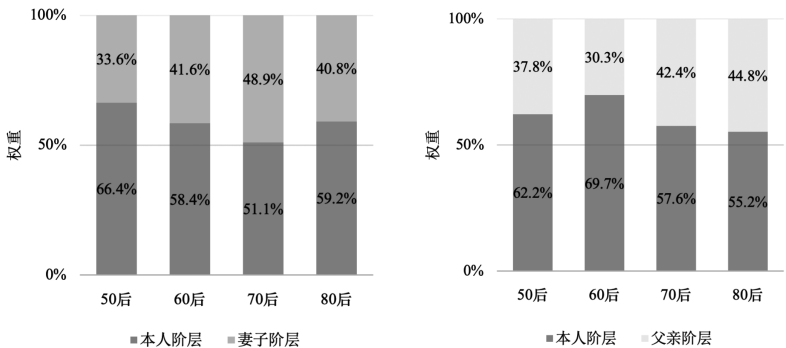


图 6: 本人、妻子与父亲客观阶层影响男性主观阶层地位的相对权重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 CGSS2010 到 CGSS2017 的合并数据,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出发,着眼于传统观念、现代化、市场化与宏观政策间的作用与碰撞,以及在此背景下家庭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探究了女性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如何受本人、配偶、家庭出身的影响,以及这三方的影响力如何随出生世代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配偶客观地位对于女性阶层地位认同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参加工作的女性(“60 后”)有最为重要的作用,其自身

阶层的作用则相对较小。一方面,这与在市场化改革初期,传统计划体制对于女性保护的减弱和市场竞争中的性别不平等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面对突然的社会转型,家庭内部应对策略有所转变,如女性照顾家庭而男性外出务工。对于之后的世代来说,配偶客观阶层的相对作用不断减弱,女性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的客观阶层进行自我定位,与配偶之间逐渐形成“地位共享”的关系模式,一方面是因为在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女性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家庭话语权的加强,另一方面也与宏观政策如计划生育对于性别平等的推动有关。其次,家庭出身对女性阶层地位认同的作用并未随世代的推移而下降,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现象与现代化变迁方向的预测并不相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代际间强关联的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房价高涨、离婚率攀升的背景下,年轻一代还是会通过对原生家庭较强的依赖来应对急剧变化的社会与不断增强的风险。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使得女性得以从代际联系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以往的相关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不同。例如,在配偶阶层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方面,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关于性别观念向传统回潮的讨论(杨菊华,2017;许琪,2018),本文发现女性的阶层认同趋于自主和独立,与近期关于夫妻地位认同时期变化的研究一致(张文宏等,2021a)。这并非是对以往研究的否定,而在于本文反映的是女性地位认同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即长期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世代变迁趋势。跨世代的比较研究分析的是不同出生世代所处的文化环境、现代化与市场化进程、国家相关政策的差异,考察的是更长时间范围内各种因素对于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在代际流动的作用方面,本文支持了以往研究关于家庭背景对子女影响持续甚至增强的观点(杨菊华、李路路,2009;郑丹丹,2019),也从世代变迁的角度进一步印证了家庭仍然是分析中国阶层认同的基本单位(许琪,2018)。现代化视角下女性从家庭到个体、从“地位借用”到“地位共享”的转变,在代内层面虽然得到一定支持,在代际层面却没有看到相应的趋势。

总之,主观阶层地位认同不仅是个体客观阶层地位的反映,也是个体与他人、结构性因素互动的产物。中国女性阶层认同的变化,也是转

型时期各方面的社会变迁在女性社会观念层面与个体心理层面的映射(李路路、王鹏,2018)。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女性阶层认同的世代变迁并不能用单一线性的现代化理论解释和预测,而是呈现了中国独特的家庭和个体现代化过程。它既包含市场转型中家庭关系从集体主义伦理向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阎云翔,2016),以及婚姻关系中女性自主地位的增强,也反映出宏观社会环境变化时,传统家庭关系影响下的代际关联与资源依赖的延续(杨菊华、李路路,2009)。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转型背景下价值观念变迁的复杂现实与多元路径。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首先,因为调查数据的局限,我们无法直接通过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观察女性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的时期变迁趋势,只能先聚焦于不同世代的变化;其次,收入是职业之外重要的衡量客观地位的指标,但由于缺少父辈的收入信息,本文难以从收入层面入手,更多元地展现客观地位的影响;最后,本文对于女性阶层认同变迁的解释是一种基于多重因素互动的综合性解释,并非通过严谨的因果分析确定某一特定因素与变迁趋势之间的作用机制,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我们期待后续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合适的数据和方法,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中国女性的阶层认同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蔡禾、吴小平. 2002. 社会变迁与职业的性别不平等[J]. 管理世界(9): 71-77.
- 陈云松、范晓光. 2016.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 中国社会科学(12): 109-126.
- 段成荣、秦敏、赖妙华. 2017. 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J]. 人口学刊(1): 5-17.
- 郭秋菊. 2016. 性别视角下已婚者的阶层认同[J]. 青年研究(4): 66-75.
- 贾云竹、马冬玲. 2015. 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以“男主外,女主内”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3): 29-36.
- 蒋永萍. 2012. “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 1-6.
- 金一虹. 2006.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J]. 社会学研究(1): 169-193.
- 李春玲、李实. 2008.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J]. 社会科学研究(2): 94-117.
- 李路路、石磊、朱斌. 2018. 固化还是流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变迁四十年[J]. 社会学研究(6): 1-34.
- 李路路、王鹏. 2018. 转型中国的社会态度变迁(2005—2015)[J]. 中国社会科学(3): 83-101.
- 李培林、张翼. 2008.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 社会 28(2): 1-19.

- 李路路、朱斌. 2015.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5): 40-58.
- 李实、宋锦、刘小川. 2014. 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J]. 管理世界(3): 53-65.
- 李汪洋、谢宇. 2015. 中国职业性别隔离的趋势: 1982—2010[J]. 社会 35(6): 153-177.
- 刘爱玉、佟新. 2014.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J]. 中国社会科学(2): 116-129.
- 刘汶蓉. 2016. 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J]. 社会学研究(4): 145-168.
- 刘欣. 2001. 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J]. 社会学研究(3): 8-17.
- 陆万军、张彬斌. 2016.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J]. 人口研究(4): 21-34.
- 彭青青、李宏彬、施新政、吴斌珍. 2017. 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J]. 金融研究(6): 33-49.
- 石金群. 2016. 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 机制、逻辑与张力[J]. 社会学研究(6): 191-213.
- 谭深. 1997.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 社会学研究(1): 44-49.
- 王甫勤. 2011. 社会流动有助于降低健康不平等吗?[J]. 社会学研究(2): 78-101.
- 王跃生. 2014. 中国城乡老年人居住的家庭类型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1): 20-32.
- 王跃生. 2016.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J]. 人口研究(5): 33-49.
- 吴小英. 2009. 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 中国社会科学(2): 163-176.
- 吴愈晓、吴晓刚. 2008. 1982—2000: 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J]. 社会 28(6): 128-152.
- 许琪. 2016.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 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3): 33-43.
- 许琪. 2018.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 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J]. 社会学研究(6): 102-129.
- 许琪、熊略宏. 2016. 本人还是配偶? 谁决定中国已婚女性的阶层认同[J]. 中国青年研究(12): 12-20.
- 阎云翔. 2016.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杨菊华. 2014. 传统与策略: 1990—2010 年中国家务分工的性别差异[J]. 学术研究(2): 31-41.
- 杨菊华. 2017. 近 20 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延续与变迁[J]. 山东社会科学(11): 60-71.
- 杨菊华、李路路. 2009.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3): 26-53.
- 叶华、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J]. 社会学研究(5): 153-177.
- 张海东、杨城晨. 2017. 住房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5): 39-63.
- 张文宏、刘飞、项军. 2021a. 中国夫妻的地位认同: 2010—2017——共识、性别化与社会变迁[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4): 55-65.
- 张文宏、刘飞、项军. 2021b. 相对收入与中国夫妻地位认同——基于“社会比较—性别规范”框架的分析[J]. 学术月刊(9): 139-150.
- 曾旭晖、李奕丰. 2020. 变迁与延续: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J]. 社会 40(5): 190-212.
- 郑丹丹. 2019. 代际“资产并表”、同类婚与贫富分化代际增强——人口政策与市场转型的叠加效应[J]. 开放时代(1): 194-208.
- 周福林. 2007. 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J]. 西北人口(1): 63-66.
- 左际平. 2005. 20 世纪 50 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 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J]. 社会 25(1): 182-209.
- Abbott, Pamela. 1987. “Women’s Social Class Identification: Does Husband’s Occupation

- Make A Difference?" *Sociology* 21(1): 91-103.
- Abbott, Pamela and Roger Sapsford 1987. *Women and Social Class*. London, UK: Tavistock.
- Abelmann, Nancy. 1997. "Women's Class Mobility and Identities in South Korea a Gendered, Transnational, Narrative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2): 398-420.
- Acker, Joan. 1973.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4): 936-945.
- Allen, Sheila. 1982. "Gender Inequality and Class Formation." In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edited by A. Giddens and G. Mackenz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xter, Janeen. 1994. "Is Husband's Class Enough? Class Location and Class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weden, Norway, and Austral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2): 220-235.
- Besamusca, Janna, Kea Tjzens, Maarten Keune, and Stephanie Steinmetz. 2015. "Working Women Worldwide. Age Effect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117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74): 123-141.
- Bloom, Nicholas, James Liang, John Roberts, and Zhichun Jenny Ying. 2015. "Does Working from Home Work?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1): 165-218.
- Chen, Feinian. 2005. "Employment Transitions and the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China." *Social Forces* 84(2): 831-851.
- Chen, Meng. 2018. "Does Marrying Well Count More Than Career? Personal Achievement, Marriage, and Happiness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3): 240-274.
- Curtis, Josh. 2016.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Identity: The Role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33 Societies, 1999-2009."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1): 108-121.
- Davis, Nancy J. and Robert V. Robinson. 1988.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 103-112.
- Davis, Nancy J. and Robert V. Robinson. 1998. "Do Wives Matter? Class Identities of Wives and Husba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4-1994." *Social Forces* 76(3): 1063-1086.
- De Graaf, Nan Dirk, Paul Nieuwbeerta, and Anthony Heath. 1995. "Class Mobility and Political Preferences: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4): 997-1027.
- Deng, Zhon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7.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391-428.
- Elder Jr, Glen H. 1994.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7(1): 4-15.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88. "Women at Class Crossroads': A Critical Note." *Sociology* 22(4): 545-553.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a.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Robert and John H. Goldthorpe. 1992b. "Individual or Family? Results from Two Approaches to Class Assignment." *Acta Sociologica* 35(2): 95-105.
- Erikson, Robert, John H. Goldthorpe, and Lucienne Portocarero.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0(4): 415-441.
- Ganzeboom, Harry B. G. and Donald J. Treiman.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3):201-239.
- Goldscheider, Frances K. and Linda J. Waite. 1991. *New Families and No Famil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Hom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c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4):465-488.
- Goldthorpe, John H.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the Replies.” *Sociology* 18(4): 491-499.
- Goldthorpe, John H. and Clive Payne. 1986. “On the Class Mobility of Wome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Recent British Data.” *Sociology* 20(4): 531-555.
- Hayes, Bernadette C. and F. L. Jones. 1992. “Class Identification among Australian Couples: Are Wives’ Characteristics Irreleva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3): 463-483.
- Hayes, Bernadette C. and Robert L. Miller. 1993. “The Silenced Voice: Female Social Mobility Pattern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Isl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4): 653-672.
- Hu, Yang. 2016. “Impact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n Family and Gender Values in Chin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12(3): 251-272.
- Inglehart, Ronald.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4):991-1017.
- Inglehart, Ronald and Wayne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19-51.
- Jackman, Mary R. and Robert W. Jackman 1983.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in, Lei, Tony Tam, and Lin Tao. 2019. “Well-off But Powerless? Status Incongruenc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35): 112345.
- Kulik, Liat. 2002. “The Impact of Social Background on Gender-Role Ideology: Parents’ Versus Children’s Attitud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1): 53-73.
- Luo, Ye and April Brayfield. 1996. “Women’s and Men’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Sociological Spectrum* 16(1): 83-107.
- Marks, Jaime L., Chun Bun Lam, and Susan M. McHale. 2009. “Family Patterns of Gender Role Attitudes.” *Sex Roles* 61(3-4):221-234.
- Newman, Harmony D. and Emily E. Tanner-Smith. 2008. “Married Persons’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Gender Ideologies from 1972 to 2002.” *Gender Issues* 25(2): 114-140.
- Parish, William L. 1981. “Egalitarianism in Chinese Socie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30(1): 37-53.
- Parish, William L.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edited by J. Wats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84-120.
- Ritter, Kathleen V. and Lowell L. Hargens. 1975. “Occupational Positions and Class Identifications of Married Working Women: A Test of the Asymmetry Hypo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4):934-948.
-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861.
- Shu, Xiaoling. 2005. “Market Transition and Gender Segrega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6(s1): 1299-1323.

- Shu, Xiaoling and Yifei Zhu. 2012. "Uneven Transitions: Period- and Cohort-Related Changes in Gender Attitudes in China, 1995-2007."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5): 1100-1115.
- Sobel, Michael E. 1981. "Diagonal Mobility Models: A Substantively Motivated Class of Designs for the Analysis of Mobility Effec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6): 893-906.
- Sobel, Michael E. 1985.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Some New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5): 699-712.
- Sorensen, Annemette. 1994. "Women, Family and Clas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 27-45.
- Stanworth, Michelle.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Sociology* 18(2): 159-170.
- Treiman, Donal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40(2): 207-234.
- Treiman, Donald J. 2013.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5(3): 3-25.
- Wright, Erik Olin. 1989. "Women in the Class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17(1): 35-66.
- Wright, Erik Olin. 2005.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u, Xiaogang, Hua Ye, and Gloria Guangye He. 2014. "Fertility Decline and Women's Status Improvement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6(3): 3-25.
- Yaish, Meir and Robert Andersen. 2012. "Social Mobility in 20 Modern Societies: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1(3): 527-538.
- Yamaguchi, Kazuo and Yantao Wang. 2002.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arried Employed Women and Men 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2): 440-475.
- Zhang, Yuping, Emily Hannum, and Meiyang Wang. 2008. "Gender-Based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 Consid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Social Forces* 86(4): 1529-1560.
- Zhao, Yizhang, Yaojun Li, Anthony Heath, and Nick Shryane. 2017.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Effect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8): 54-66.
- Zhou, Xiang and Yu Xie. 2019. "Market Transi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Trends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4(6): 1810-1847.

责任编辑: 张 军